

学术新视野

XUSHU XINSHIYE

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

MINGQING JIANGNAN XIAOFEI WENHUA YU WENTI YANBIAN YANJIU

邱江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 文体演变研究

邱江宁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 / 邱江宁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9

ISBN 978-7-5426-3123-7

I. 明... II. 邱... III. ①消费—文化—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IV. D691. 93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9801 号

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

著 者 / 邱江宁

责任编辑 / 陈宁宁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制作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徐曙蕾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8.25

ISBN 978-7-5426-3123-7

I · 439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消费文化与文学文体研究(代序)	1
-----------------------	---

第一章 明中后期的商业和出版风尚与文学文体关系

概说	27
第一节 商业出版、消费文化与陈继儒的影响及 文学史地位	28
第二节 崇奢尚华风气与王次回“艳体诗”的产生及影响	43
第三节 士、商融合与商人传记的书写—— 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案例讨论	68

第二章 清代消费文化与文学文体关系

概说	94
第一节 江南女性读者群体的崛起与清初才子佳人 小说的盛行	95
第二节 鸡林重价与李渔文体的市场化研究	111
第三节 消费文化影响下黄丕烈题跋文的文体新变	135





第三章 清末民初商业出版风尚与文学文体关系

概说	160
第一节 精英之士与市场之文——新式的商业出版与 王韬的报章体	161
第二节 消费文化影响下《海上花列传》的文体选择	185
第三节 商务印书馆与林译小说的出现及影响	209

第四章 消费文化影响下主流文体对于商业化文体的渗透

概说	233
第一节 明中后叶出版风尚与八股文对于《金瓶梅》的 文体影响	234
第二节 清初出版风尚与主流文体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渗透 ...	251
后记	265
参考文献	267



消费文化与文学文体研究(代序)

何谓文体?人们或将文体等同于文学体裁,这种看法占有大多数;或认为文体包含体裁(样式)与体性(风格);或认为文体是语言加主题加风格。中国古代文论所谓的文体既指文类(即体裁),又指语体、风格等。西方的 style 一词,可以翻译为文体、语体、风格、文笔、笔性等,所以,文体概念大致说来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①。“文体其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时代和群体选择了一种文体,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②。说到底,文体主要看作者的“叙述”方式或倾向怎样,文体的特征及其划分,往往取决于其层面结构中某些因素的强化、突出或变异。文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表达,就是选择,就是风格,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强调。文体与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别林斯基认

①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导言,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绪言”,《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为,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世界有多少伟大的或才能卓著的作家,就有多少种文体^①。

文体由哪些元素构成?文体的构成包括表层的文本因素,如表达手法、题材性质、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格式,以及深层的社会因素,如时代精神、民族传统、阶级印记、作家风格、交际境域、读者经验等。致使文体发生变化的因素又主要体现为这么四方面:作家群体、阅读群体以及传播市场、传播载体,这些要素本身无时无刻不处于动态变化中,随着这些要素的改变,文体亦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明中叶以后至近代是文体变化非常复杂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传统文学文体转型频仍时期,也是中国文学文体现代化进程进展的关键时期。而引人注意的是,大量文体转型、变化现象又较集中地出现于江南地区^②,或由江南区域发散、引导和带动。

例如晚明小品文的盛行即始由江南士人发起,并先盛行于江南地区。四库馆臣认为,小品文的盛行是《世说新语》的影响与陈继儒的作用:

……([宋]周密《澄怀录》提要)亦《世说新语》之流别,而稍变其体例者也。

明人喜摘录清谈,目为小品,滥觞所自,盖在此书矣。^③

又云:

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

① 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② 按:本文所叙述的江南地区特指明代的浙江和南直的江南地区及扬州府,即今之浙江、江苏、安徽二省长江以南及扬州、泰州二市,参考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0页。

③ 《四库全书·澄怀录(宋·周密著)提要》。





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探觚;小品日增,危言叠煽,求其卓然蝉脱于流俗者,十不二、三。^①

《世说新语》在明中叶之际大行于江南。先是嘉靖十四年(1535)吴郡袁褰序刊《世说新语》,嘉靖二十九年(1550)松江何良俊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蓝本,杂采宋、齐以后事迹续成《何氏语林》,引起反响。之后,嘉靖三十五年太仓王世贞补注《世说新语》。万历八年,王世贞弟王世懋序刻《世说新语补》。《世说新语》在文人中影响巨大:“盖自隆、万以来,而《世说新语》大行东南天地间,若发中郎之帐,而斫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谈,士不授不得称名下也”^②。《世说新语》刊本大量面世之后,模仿《世说新语》的小品文纷起,诸如松江华亭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江宁焦竑《焦氏类林》、吴江俞安期重刻《续世说新语》、焦竑序刊《玉堂丛语》、李绍文辑《艺林累百》等等,皆是此类作品。待到“公安派”加入小品文写作行列,小品文写作逐渐蔚为风气。而其时著名文人陈继儒的个人影响最著。陈继儒乃松江华亭人,年未三十弃诸生学籍,以著述为事。陈继儒在晚明的影响之大,堪称家喻户晓,“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其书籍“为(时人)枕中之秘”^③,正是凭借其极具风致的短翰小品,陈继儒一举成为“文苑主盟”,更兼其在江南士人中影响极大“三吴名下士争欲得为师友”^④,小品文遂由此而兴盛于江南,晚明小品文是先盛行于江南然后再影响到全国,成为晚明诸文体中势头最强者之一的。

再如世情小说的兴起。《金瓶梅》乃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以《金瓶梅》的流行而带动了世情小说的兴起。时届今日,学界依然为《金瓶

① 《四库全书·续说郭(明·陶珽著)提要》。

② 转引自吴承学《旨永神遥明小品》,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③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37—638页。

④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明史》第2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7631页。





梅》的作者问题头痛不已。人们总是试图从小说文本中所涉及的方言信息、风俗信息或者民谚小调等内容获得作者的生平线索。但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起初流布、刊刻、接受的地域却是在江南地区,确切地说,江南地区才是《金瓶梅》由隐而显,发生影响的地区:1596年,袁宏道向董其昌致信,问“《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①,这是迄今所见最早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这则信息表明这时《金瓶梅》已在文人圈中以抄本形式流传。袁氏乃湖北人,此时却已在吴县做官几年,董其昌则是松江华亭人。1604年,冯梦龙在沈德符苏州寓所见到钞本《金瓶梅》。1609年,沈德符见袁中道^②所携《金瓶梅》全本,借抄携归。冯梦龙见之,怱怱书坊以重价购刻。1617年,《金瓶梅》在苏州的书坊刊成而流布市面。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相传乃李渔所作,一直到1695年张竹坡在金陵完成《金瓶梅》的评点,现存明清时期《金瓶梅》刊本亦多为江南地区书坊刊刻(当然,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乃全国刻书基地亦是一大原因)。现存有关著录《金瓶梅》信息的文献皆表明《金瓶梅》是在江南地域流行。由于《金瓶梅》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以描画日常琐事为主要内容的世情体小说盛行。且不论《金瓶梅》用何种方言写作,作者为谁,其引起反响和效颦者在晚明之际的江南,其意义和影响亦由江南地区所挟发这些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更有体现文体迁变的“公安派”之兴起同样与江南地区密切关联。“公安派”的兴起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后,其时,流派核心领袖袁宏道在吴县做县令。此际,袁中道亦往来游历于江南一带。公安派的几大干将江盈科、陶望龄等以及董其昌、潘士藻、李流芳、潘之恒、方文儒、汤宾尹、钱谦益、郝之玺等大量影集附响者亦多为江南士人或居住江南

① 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7页。

② 按:其时袁中道客居金陵。





者^①。尤值得一提的是,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者徐渭是浙江绍兴人,而“公安派”重要言论、代表作的发表、刊刻亦在江南地区,并由江南地区向全国辐射。像袁宏道著作创作以及刊刻皆在江南地区:袁宏道自1602年始于苏州陆续刊行所著诸书,计有《潇碧堂集》20卷、《广庄》1卷、《瓶花斋集》10卷、《瓶史》1卷、《解脱集》4卷、《锦帆集》4卷、《敝篋集》2卷、《去吴七牍》1卷,这些著作皆由吴郡袁无涯书种堂刊刻,以其所分种数及集名,悉合作者原意,故袁宏道本人亦称之为“精本”^②。而代表公安派理论旗帜的一系列文章《叙小修诗》(袁宏道)、《敝篋集引》(江盈科)、《解脱集序》(一、二,江盈科)、《解脱集序》(袁中道)亦是作者身处江南,并发表刊行于江南之作。之后,“公安派”影响遍及天下,流派成员行踪遍于天下,亦为天下人所追随,踪其发祥之迹,则不可略过江南地区。

明中叶至近代,江南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相对最为发达的地域。明中晚时期,全国最繁忙的商业中心主要是湖广的荆州、江西的樟树、南直的芜湖、上新河、南濠、瓜洲、正阳,浙江的枫桥、湖州,山东的临清,其中七处是在江南地区^③。以金陵为例。

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挖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渔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奢侈者争趋效之。庐、凤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皆窳轻眇,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贾操巨万贯以奔走其间,其利甚钜。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榷转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

① 按:公安派大将江盈科是湖广桃源人,但自1592年中进士后即为长洲县令,其创作高潮亦在此期间,其著名代表作《雪涛阁集》于1600年刻于苏州。

②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注》“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③ [明]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页。





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矣。^①

江南地区便利的交通、密集的人口、发达的商业、繁荣的城市刺激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崇奢尚华，争效侈靡，消费主义思想在该地域占据主流地位，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态度等方方面面亦体现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对此，晚明张瀚深有体会，他在《松窗梦语》中描述道：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

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②

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③

以上所引材料都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而文体选择与文体研究都是很纯粹的文学问题，二者看似风马牛不及，但文学问题的出现、变化发展却会受到许多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际上，影响文体选择与迁变最深的外界因素应是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生活。晚明小品文、世情小说的兴起亦与《世说新语》、《金瓶梅》在江南地区大量刊行、流布密切相关，说到底是商业消费原因所导致。晚清民国之际的《海上花

①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

②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

③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5页。





列传》，其于文体创变意义不凡：乃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打破才子佳人小说写作之体，行开放方式结局小说；开创乡下人进城写作题材；首用方言写作，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且最早以刊物连载形式发表该作，等等，而《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为江南士人，所叙亦上海之事，该作只在江南士人中风行，北人不能卒读。而上海乃其时全国甚至全世界消费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由上种种文体迁变现象之描述可以看到江南作为明中叶后商业消费文化较为发达地区，文体创新、文体迁变现象颇为频密。虽然消费文化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表征之一，其与文学文体不构成直接、必然关系，但对文体变化却可能产生不容小视的影响，很值得注意。

二

消费文化对于文学文体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作家、读者、文本传播等因素来影响的。消费改变了作家群体和作家生活方式、改变了读者群体和阅读方式、改变了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当这些构成文体选择与文体发展的因素都发生着不期而然的变化时，文体本身也就必然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化。

消费文化首先改变了创作各种文体的文人。这种改变是从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审美观等等由内至外的深切改变开始的。张瀚云：

迨今承平日久，士人非科第无以自见，故始为诸生欣美。一举不啻起渊谷中，飞腾霄汉间也。既推上矣，美登甲第，汲汲不减诸生时。既成名矣，驷骖希冀显荣。一命以上，寸计尺积，岁无宁日，日无宁时。即位列公卿，犹思恩逮上世，赏延后裔。盖终其身未尝忘进取，何能定静安舒？所谓诵法圣贤者，取陈言、应制科





尔。甫服冠裳，辄尽弃去。悲夫！以是立功名且不可，何论道德？^①

张瀚尖锐地批评明中叶以后的士人汲汲于科第仅是以富贵为念，丧失了传统士人立德、立功的价值理念。张瀚自己出生中产之家，又科场顺利，言论未免夺情。有明一代，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盛产山人，四库馆臣云：“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②。而有意味的是，山人大量出现的时间正是张瀚批评的明清消费文化盛起时间，且山人大多为江南一带士人。当发达的经济和商业消费刺激着人们的人生欲望，而严苛的科举制度又杜绝了大量士人凭借科举获得富贵以及生活资料时，谁能在“寂寂寥寥一床书”的情况下，安贫乐道固守一些没有实利的虚文呢？藉由明中晚叶后士林所引为楷模者，则能更直接地窥破文人随着消费文化的热炽与日益盛行，在价值观与人生观方面的巨大变化。“今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矣，岂仅公卿大夫折节下之乎？繁惟明之中晚，士名噪当时者，前无若李卓吾，后无若陈仲醇”^③，句中提及的李贽、陈继儒、李渔三人为明中叶以来最受士人推崇者。且不论在哲学思想上彻底解放文人的李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二者。陈继儒 29 岁焚毁儒衣，李渔在明清易代大约 35 岁左右弃却儒业。二人一生都无功名，皆以著述为事，卖文为生，而且他们的作品以及名字在消费市场上都具有品牌效应，他们亦借此过着富足风雅的生活。他们的人生选择完全迥异于传统文人：传统文人且不论正统者如屈原、杜甫，奉官守儒，以致君尧舜为念，便是司马相如一类标格出世者，亦慕蔺相如之为人，以功业为人生终

①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士人纪”，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1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〇，《牒草》提要，四库全书本。

③ [清]包瑑：《〈一家言全集〉序》，《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极追求。可是,陈继儒、李渔等人却成为文人的时尚标杆:“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鸡林词客,孰不视为指南?”^①消费市场上的红牌人物取代传统文化秩序所标榜的道德高尚或者功业卓著者成为士人的人生目标,足以说明消费文化影响下士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

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与介入下,文人卷入到消费世界,并将自己的精神产品作为可以交易买卖的消费产品,从中获得利润与收益。例如明季常熟人桑思玄,“尝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②,桑氏之言,几于明白不含糊地向人索要润笔。毛先舒就很直接地说李渔:“卖赋多金者,相如以后,如笠翁者原少”^③。司马相如卖赋开文人卖文之端,却尚未成为商品交易之商业行为,而李渔等人的作品则是作为商品标价出售,以获得利润,存在着买卖双方都明白的商品交易性质。无怪明中叶后,江南俗语中,以取人钱为称作“精神”^④,商品消费意识对其时人之影响实在是濡截深矣。

当文人创作的精神产品不是为统治者效劳,而是为消费者与消费市场服务时,它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文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文人的行为方式、作品创作动机、创作方式等等也因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直接参与者,李渔依旧是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以他为例非常有典型意义。由于李渔的文化产品在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影响,能带来许多商业利益,于是,“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既然能获得许多商业利益,想浑水摸鱼、分取一杯羹之渔利商人自然就多,这大大侵犯了李渔本人及其书坊的商业利益,也当然地影响了李渔的行为方式与心态。李渔

① [清]芥子园主人:《〈一家言全集〉弁言》,《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清]李诩:《戒庵漫笔》卷一,《常洲先哲遗书》8—9册,清刊本。

③ 按:此语出自毛先舒为李渔《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所作眉评,《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④ [清]李诩:《戒庵漫笔》卷一,《常洲先哲遗书》8—9册,清刊本。





在《与赵声伯文学》云：“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板者多，故违安土重迁之戒，以作移民就食之图。不意新刻甫出，吴门贪贾，即萌覬覦之心。幸弟风闻最早，力恳苏松道孙公，出示禁止，始寝其谋。乃吴门之议才熄，而家报倏至，谓杭人翻刻已竣，指日有新书出贸矣。弟以他事滞金阊，不获亲往问罪，只命小婿谒当事，求正厥辜。虽蒙稍惩贪恶，现在追板，尚未知后局何如？……似此东荡西除，南征北讨，何年是寝戈晏甲时？”^①在消费市场的影响与作用下，李渔为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违背“安土重迁”的传统价值观念而四处流徙奔波。毋庸置疑，作家的流徙与迁移，动摇的不仅是传统观念，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它还将对创作群体以及地域创作风格产生深刻影响。如前所举“公安派”兴起之例。由于湖广作家袁宏道、江盈科等人到苏州吴县、长洲作官，与江南士人董其昌、陶望龄、钱谦益、潘士藻、潘之恒等结社、唱酬，互相品评诗文、“党同伐异”，致而推动了“公安派”的崛起与盛行。

而且作家行动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他们心态的改变。李渔自制的芥子园名笺本拟“自制自售”，以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本已昭告天下不许翻梓，无奈利之所驱，“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这令李渔深为愤慨与暴怒：“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②。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李渔利用自己与达官贵人的关系与书商进行斡旋与战斗，并咬牙切齿，发誓战斗到底。这种行为大大违逆了文人温柔敦厚、不与人争利的传统形象，完全堕入孔子所鄙夷的硁硁小人之行径。

在消费文化的介入与影响下，文人的写作内容与表达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变化。以冯梦龙的《折梅笺》为例。冯梦龙所以要编写这

^① [清]李渔：《与赵声伯文学》，《笠翁文集》卷三，《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8页。

^② [清]李渔：《闲情偶寄·器玩部》，《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么一部尺牍写作教材,纯粹是市场消费的需要。编撰者余长庚在序言中就很明白地表达了这种意思:

今士庶人家,大都以尺素为酬答,亦知非此不足修往来之好,通朋情之雅。甚而南极流辉,颂堂前而酌兕觥;或音容缥缈,叙平生而啼杜鹃。于是吮毫伸纸之际,非苦于才思,则腐谭满楮。……犹龙冯先生以天孙之织锦,纪人间之琅玕;可富贫人之腹,可增文人之慧;浅深各致,雅俗咸宜。庶几风雨如晦,鸡鸣未已,得是编以志其往来。即或西方美人寤言玉士,亦可凭是编以通其款曲。故不欲藏作家秘宝,因寿诸梨枣,以公天下。^①

因为市场需要文情兼美的尺牍,所以冯梦龙就编写了雅俗兼宜、各体俱备的尺牍全编。为照顾到初学者,该编具列了写给各种身份者的尺牍的写作格式和范文,读者只要依据具体情况套用即可。而且,为照顾一些信件来往频繁的人群,该编还特拟诸如“夫妇丰韵”、“幽阁丰韵”、“朋友丰韵”、“情妓丰韵”等几种“丰韵情书”的代拟文,无怪编者云:“即或西方美人寤言玉士,亦可凭是编以通其款曲”。实际上,一旦该书在手,即使是文墨不通者亦可写出温情雅丽、情致款款的尺牍来了。

在消费文化的介入下,作者甚至自己也不能控制作品的内容。凌濛初编撰《拍案惊奇》是因尚友堂书坊主人眼红于冯梦龙“三言”之畅销,央其写就;《二刻拍案惊奇》更是受消费之利刺激而完成。情痴道人在其《肉蒲团》开篇便公然宣称,其小说就是要世上人拿银子买了去看。近代通俗作家周天籁的小说《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上连载一年后,已有50余万字,本拟结束,报社老板“急来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因又写三十余万字,共八十万字,要求结束。又来阻止。至

^① [明]余长庚:《折梅笺·小引》,魏同贤王汝梅孟凌君编《冯梦龙文学全集》第24册,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一百万字时，一切不顾，将女主角‘饮恨而歿’，‘全书完’付之”^①。为了迎合消费市场，顾及商业利润，周天籁的创作已经相当被动了。畅销书作家尚且如此，一般作者则可想而知。

而且写作内容改变之后，表达方式亦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化。包璿评价李渔的创作云“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当世之人尽聒聒矣，吾欲与之庄语道德固不可，既欲与之庄语经术复不可，则不得不出之以诙谐滑稽焉。……使圣人生于今日，而拘拘守一先生之言，深衣幅巾，正色庄语夫人曰：‘此为道德’、‘此为经术’，吾知愚者听之无不卧，才者听之无不拂衣起走。然则笠翁虽欲不诙谐滑稽不可得矣”^②。显然，当文人的创作是面对广大的消费者时，便不能自说自话，孤芳自赏，他们必须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创作，通过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解说道理与经典，这种下放姿态和平视经典的做法与态度当然是与传统文人的创作态度与表达方式大相径庭。民国时期上海大量创办销售的小报为其时一大文化特征，小报的特点就是“专门记载零碎趣闻，插科打诨，闹闹玩意儿，甚至于韩庄的秘密、性生活的变态等等，也不妨赤裸裸地连篇累牍的登载，这就是所谓小报”^③，与大报不同的是：“大报的新闻重时间性，小报的新闻重趣味性”；“大报多硬性新闻”、“小报以软性为多”；“大报是用正面或直视的方法观察社会，小报则是用侧面或透视的方法来观察社会”^④。很显然，文人们除非与社会生活绝缘，否则以书写文人士大夫个人的自说自话的传统言说方式就只能放下姿态，置身于鸡零狗碎的平常琐屑世界，“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

① 周天籁：《逍遥逍遥集·亭子间嫂嫂》，台北星光出版社1976年版，转引自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② [清]包璿：《〈一家言全集〉序》，《李渔全集》第一卷《笠翁一家言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 镜水生：《报之大小问题》，载《人间地狱》，1926年1月3日，早期小报文章均无新式标点。

④ 张君良：《海上小报泛论》，申时电讯社十年纪念刊《十年》，第173页。

